

间,明朝在榆林构建了长城防御体系,此后逐渐完善。不过由于陕北生态环境恶劣,经济条件落后,导致榆林镇一直处于财政匮乏的状态。嘉靖年间兵部职方司主事许论撰《九边图论》,便认为榆林镇最大的问题便是财政。万历年间,已有官员指出如果不解决陕北的财政问题,这一地区将成祸乱之地。事实也不幸应验。因此,对明末包括张献忠起义在内的农民战争爆发原因的讨论,便可以引入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视角与方法,考察明末榆林生态环境、经济条件、社会结构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这种研究模式不妨可以称作“区域农战史”研究。这将会大为改变此前农战史研究过于强调从国家的视角,“自上而下”进行研究,忽视农民战争与地方社会的关系的局面,从而增加“自下而上”的角度,将研究引向具体与深入。

再比如屠蜀问题,目前研究已经揭示了各种势力在四川都进行了屠杀行为。那么,这种屠杀行为对四川造成了什么影响,屠杀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清初史籍会对张献忠屠蜀有如此繁多、详细、生动的记载?张献忠杀人与其幼年经历、精神状态有无关系。这些都是深入下去会有巨大收获的问题。

总之,目前包括张献忠研究在内的中国农战史研究,迫切需要回归学术本身,严格依据史料,利用多学科的视角方法,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综合研究。如果这样的研究能够开展的话,将是大大不同于以往的新型农战史研究,是“新农民战争史”研究,农战史研究的重新繁荣也便可以预期了。

清代仓储制度研究述评

闫文博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天津 300071)

中国古代专制王朝的仓储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能够直接反映出专制王朝富裕程度,而且它的正常运转及充盈直接关系到帝国的国势走向。每当国库充盈之时,王朝也多出现开明之世,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秩序稳定;而每当国库亏空之时,伴随而来的也往往是贪污腐败、民不聊生。因此,对仓储进行严格的管理及控制,对仓储管理官员及吏役进行严密的监控也就十分必要。在清代的仓储管理中产生了许多值得借鉴并发扬的制度,而这些制度又以成文法或者惯例的形式流传下来,对仓储制度进行详细的梳理并分析可以窥见王朝诸多与此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故而十分必要。仓储制度的研究虽然已经有许多学者予以关注,但这个领域的研究还远远没有达到让人满意的地步,还有大量必需的研究工作有待开展深入。

一、清代仓储总体情况的研究

在此之前,对于清代仓储制度的研究综述已有出现,但不是将仓储制度作为一个专门领域进行评述,而是在论述其他专门史的时候稍微提及,如朱浒的《二十世纪清代灾荒史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余新忠的《1980年以来国内明清社会救济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9期)等,因仓储制度在灾荒史、社会救济史中具有一定作用而简单介绍,并不全面,因此有必要对清代仓储制度的研究进行专门整理。

关于中国古代仓储制度的研究,建国以前即已开始,其中较有建树的是邓拓、于佑虞等人。邓拓(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是我国学术史上第一部较为完整、系统、科学地研究中国历代灾荒和救荒的学术著作,其中对仓储的种类、性质及利弊得失进行研究,认为大抵常平仓之作用,在平谷价,其办法即由政府出余本于丰年谷贱之时,略高其价,广为收贮;待凶年谷贵之时,即略抑其价以便民间余买。于佑虞《中国仓储制度考》(正中书局,1948年)分为三个部分,他首先对中国古代的仓制进行了简要的描述,其次则分别论述了常平仓、义仓和社仓三大类仓,再次是对中国古代的仓储制度进行评价,指出其利弊。他认为历代仓储在社会经济中国有重大贡献,但仓种众多,管理不一,难免弊窦丛生,最主要就在于一是“基金短绌”,二是“利不普被”,从而使其无法真正发挥作用。但总体上讲,他认为古代的仓储制度在充实国防、防止灾荒、调剂粮价、盘活金融和协助产销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中国台湾学者李汾阳近年来也关注清代的仓储制度,他的《清代仓储研究》(台北文海出版社,2006年)从分析清代仓储思想的源流与制度传承入手,着重研究了中央仓储制度的建立和各省区仓储体系的建构及内容,论述仓场衙门长官的设置,并依仓场衙门收况、转输、收储、支放四方面的职掌来分析其动态的运行及其弊端;比较了清代中央仓储与地方仓储的关系,认为中央仓储对地方仓储有一定的协助,而地方仓储也对中央仓储有支援作用。值得称道的是运用大量的史料制成了32个统计表,包括清代仓场侍郎年表、清代仓场侍郎惩处原因统计表、清代仓场侍郎业务过失惩处原因表等,这些统计表的制作不仅直观地反映了作者的研究成果,更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重要参考,颇有价值。法国学者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也关注了中国古代的仓储制度,他与王国斌(R. Bin Wong)合著的《养民:中国的国营民仓制度,1650—1850年》(“Nourish the People: The State Civilian Granary System in China, 1650—1850”.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1)一书中,对清代官仓和半私有的民仓(即常平仓、义仓和社仓)制度,作了透彻而全新的研究。认为在清代前期(特别是18世纪),政府保证了仓储制度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以及仓储制度与其他制度(如漕粮、捐纳等)之间的高度协调。书中广泛利用北京与台北所藏的明清档案,获得丰富的政策制定与机构管理方面的新资料,以及大量的储粮数字,着重研究了粮储的技术、出纳管理中的困难、防止管理不力与腐败的控制机制以及《民数谷数奏折》中揭露出来的问题。

除了这些专著以外,还有许多学术论文对清代的仓储制度进行了研究。徐建青《从仓储看中国封建社会的积累及其对社会再生产的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从封建社会剩余产品分配的一个方面即社会积累方面,探讨了仓储产生的原因、条件及其作用。他

认为在中国古代,仓储作为一种社会积累,取得了相对独立性的一部分生产资金,而这是与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下小农经济的存在联系在一起,它形成于社会剩余产品的分配与再分配过程中,有不同的途径和方式。他认为仓储积累的结果首先是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提供了生产周转资金,其次调节了地区间粮食供需关系,再次在国家宏观调控作用下调节市场价格,同时对兴修一些农田水利工程等扩大生产性的基本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

侯寿昌《清代仓储制度》(《平准学刊》第四辑下册,1989年)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财政类档案史料,对清代仓储制度的兴衰利弊作了探讨,他认为清代仓储制度的建立和推广,对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稳定和发展都起了一定促进作用,但也有诸多弊端。康沛竹《清代仓储制度的衰败与饥荒》(《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3期)考察了晚清饥荒与仓储的关系,指出晚清仓储制度的衰败是当时饥荒极其严重的重要原因,而其衰败则主要体现在不及时采买、仓廩管理不善、变卖挪用侵盗仓谷严重、监督体制有名无实、积钱以代谷日盛五个方面,以致仓储制度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黄鸿山、王卫平《传统仓储制度社会保障功能的近代发展——以晚清苏州府长元吴丰备义仓为例》(《中国农史》2005年第2期)认为,作为传统的救荒机构设立的苏州丰备义仓,由官府管理,且只具备救济灾民的职能。但重建后的丰备义仓社会保障职能得到了发展,保障面不断扩大,保障层次也有所提高。梁勇《清代州县财政与仓政关系之演变——以四川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4期)认为,在清统治者的制度设计中,州县财政与仓政本不相关,但咸丰以后,在清政府赋税不断加征的过程中,州县地方财政逐步建立,公局体制得以形成,掌握公局的地方士绅在“以公济公”的名义下,将仓政纳入到州县财政的体系之中,导致具有社区救济性质的社、义各仓的消亡。

二、仓储类型研究

清代粮仓的种类繁多,作用也不相同,但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官仓,二是民仓。官仓由政府直接加以控制,户部监督并委托各省布政使督察管理,有京仓、通州仓、漕运仓和各州县的常平仓。民仓设于城乡,由民间自行筹办,公举所管之人,但也要受政府的干预和监督,主要有社仓和义仓两类。对仓储类型的研究多集中于京通仓、常平仓、社仓和义仓。

牛敬忠《清代常平仓、社仓制度初探》(《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认为到乾隆年间,二仓都已渐有成效,但到嘉道以后渐趋破败,同光以后,虽加以重建,然效果不好,但无法否认二仓在清代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一定的作用。在《清代常平仓、社仓的社会功能》(《内蒙古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中,他认为二仓的主要社会功能是积谷备荒、灾年散赈,以稳定社会秩序。张岩《试论清代的常平仓制度》(《清史研究》1993年第4期)认为,捐纳、截漕及采买是清代常平仓的主要来源,而其分布特点则是点面结合、广泛分布,存在于全国各地大小州县,更具普遍性。其功能主要体现在平抑粮价、出借于民、开仓赈济、供给军需几个方面。其存在可以说是消极备荒中的积极行为。该作者《论清代常平仓与相关类仓之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认为,常平仓与相关类仓正是封建政府在不同区域、以不同形式进行的一种富有人情味的社会管理活动,是封建政府履行其公共经济职能的方式之一,虽然这些仓在具体运作和功能上存在着各种差异,却能在关键时互通声气,互相协济,形成较强的社

会效应。张岩《清代盐义仓》(《盐业史研究》1993年第3期)认为盐义仓是义仓的一种,大部分设于产盐区,其主要功能在于为附近盐场商灶提供救济与借贷,具有明显的“恤灶”特征。李映发《清代州县储粮》(《中国农史》1997年第1期)对清代州县上各类仓廩的储粮来源、兴建与管理、赙余办法进行了研究,认为常平仓、裕备仓、监仓等官仓的兴衰,与州县吏治好坏紧密相关,而社仓、义仓的兴废,与管理制度和经管人的品性优劣紧密相关。白丽萍《试论清代社仓制度的演变》(《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认为清代社仓的发展从时间上看呈现出明显的时段性特点,从初期的实行,到乾隆时期达到顶峰,其后因种种因素影响,逐渐衰落,晚期又有短暂勃兴;从管理制度上看,朝廷倾向于官督民办,然而在如何解决社仓管理中官方干预过多以及贪污挪用、社谷借放涣散等问题上,似乎一直没有好办法,这直接制约了社仓的发展及其作用的发挥。

赵新安《雍正朝的社仓建设》(《史学集刊》1999年第3期)利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等资料研究了雍正朝的社仓,认为社仓的建立正是由于常平仓的诸多弊端,但在发展中规模和贮量一直难以扩大,甚至时而停滞,究其原因在于政务懈弛、谷本来源困难、人才难得、地方官干预等,但总体来讲亦很有成效。杜玲《雍正时期社仓的设立:皇帝、官僚与民间》(《北方论丛》2006年第6期)认为雍正帝的社仓政策目标明确,轮廓清晰,推行得当。建立一个民间仓储体系,以便削平丰年歉岁之间的食物供应波动,为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稳定可靠的食物保障,有赖于官方的倡导,在官方的动员下,民间的有力之家通过谷本的捐输,推动了社仓的设立。黄鸿山、王卫平《清代社仓的兴废及其原因——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学海》2004年第1期)认为,社仓弊端有三,一是借还难,二是任人难,三是劝捐难,正是上述弊端使清代社仓走向衰落。除此之外,还有唐林生(《清代的常平仓制度》,《衡阳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倪玉平(《试论清朝的常平仓》,《石家庄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张伟波(《仓、廩作为一种乡村基层组织出现的原因——基于清代长安、咸宁两县的考察》,《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等对清代的常平仓制度及功能进行了研究。

三、地域仓储研究

清代的常平仓、社仓、义仓遍布全国的每一个州县,因此学者们依据自身的地域优势,对不同地域的仓储进行研究,从而为全面理解清代的仓储制度提供了素材。

于德源《清代的京、通二仓》(《中国农史》1996年第1期)考察了京仓和通州仓二仓的规模、管理机构和收放制度,认为对其管理既有成功一面也有其失败之处,其弊端主要体现在“漕粮掺假,蒙混入仓;上下串通,贪贿公行;内外勾结,盗风炽盛;铺商包揽米票,囤积居奇”等几个方面。郑清坡、郑京辉《清代直隶义仓述论》(《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11期)认为其重要特征就是国家与民间社会在其兴修、劝输捐谷、管理与经营诸方面呈现协调与合作的关系。王晓辉《清代热河地区的官仓》(《古今农业》2008年第4期)对清代热河地区官仓的建立、粮食来源、功能、管理及官仓对热河地区发展的作用等问题作了探讨。

广东地区的常平仓、社仓一度成为研究热点。陈春声《清代广东社仓的组织与功能》(《学术研究》1990年第1期)考察了清代广东社仓的建立与发展,社仓的管理及其特点,认为与常

平仓相比,广东社仓与农村基层社会的关系更为直接,具有更强的自我繁殖能力,其建立是地方官员和士绅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因此其基本管理原则是“官设民稽”。在《论清末广东义仓的兴起——清代广东粮食仓储研究之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中,他认为清末广东义仓的兴起,与常平仓和社仓的衰落是同时出现的两个相应的经济和社会过程,从这个角度揭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社会结构和社会控制方式变化的某些特点。高惠冰《清代前期的佛山义仓》(《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认为清前期佛山义仓是一个民捐民办的救灾设施,它建于佛山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受到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影响,因而有着与历代义仓不同的特点,它的备赈救荒对佛山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起了促进作用。冼剑民《清代佛山义仓》(《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认为佛山义仓长久地担负起赈济灾民的任务,使佛山渡过多次社会危机,在较为完善的管理制度下,它不断发展储备规模,正常运作,浓厚的商业经营色彩体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给中国粮食仓储制度带来的新活力。

两湖及长江流域地区的仓储也颇具特色。钟永宁《清前期湖南的常平仓与湘米输出》(《求索》1990年第1期)认为,湘米输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湖南常平仓的运行,从而使后者呈现出鲜明的外向型特征。吴滔《论清前期苏松地区的仓储制度》(《中国农史》1997年第2期)通过对清代苏松地区的仓储的变迁历程、管理和运营三个方面进行研究,揭示了仓储制度在这一特定地域中的具体落实情况。他的《明清苏松仓储的经济、社会职能探析》(《古今农业》1998年第3期)考察了明清苏松地区仓储系统的经济职能和社会控制职能,从一个侧面认识到仓储的实质及其局限性。此外,他又利用地方志和族谱等资料,对清代宜兴、荆溪地区的义仓作了案例分析(《宗族与义仓:清代宜兴荆溪社区赈济实态》,《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并着重探究了在义仓管理运营乃至社区赈济中所反映的血缘和地缘的关系,指出在清代江南社会中,宗族组织往往通过发挥其功能性职责而不是固守系谱观念,以便在社区整合中真正达到控制地方社会的目的。姚建平《清代两湖地区社仓的管理及其与常平仓的关系》(《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4期)通过考察两湖地区社仓,认为其管理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注意把社仓制度和保甲制度相结合,体现出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并重的基层控制理念,这种仓储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整合社会意识形态、稳定基层的功能。他在《内功能与外功能——清代两湖地区常平仓仓谷的采买与输出》(《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4期)中,认为清代两湖地区的常平仓作为社会救助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区域内、外的社会稳定均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外功能被明显赋予了重要地位,这种外功能的优势地位,从常平仓的设立、仓谷的采买、仓储量大小及地域分布、仓谷输出等方面都可看出来。白丽萍《清代两湖平原的社仓建设》(《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年第1期)认为清代两湖平原的社仓建设受到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制约,其发展进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带有明显的时段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代社仓制度的发展演变及其在基层社会的具体实践。他的《清代长江中游地区义仓的设置、运营及与社仓的关系》(《江汉论坛》2008年12期)认为,清代长江中游地区的义仓在发展阶段、举办形式、管理、社会功能等方面都和社仓有所不同,二者既互相补充又有所区别,共同承担着基层社会救济的重任,并对地方社会产生影响。

施由民《清代江西的仓储述论》(《农业考古》1998年第3期)对清代江西仓储的建立、经

营和作用进行了研究,认为尽管在经营中存在一些弊端,但总的来看,清代江西的仓储充实,在抗灾救荒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袁海燕《清代江西的家族、乡绅与义仓——新城县广仕庄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对清代江西新城县义仓进行个案研究,探讨了乡绅、家族在地域社会中的地位及其社会控制权的建构过程。

吴洪琳《论清代陕西社仓的区域性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1辑)认为陕西社仓主要来源是用部分羡银采买,因此其设立之初规模就比较大,分布也非常广,但由于地理等因素的限制,分布并不均衡,而且陕北、关中、陕南三个地区的社仓发展、衰落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清代陕西社仓的经营管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中,他考察了清代陕西社仓的经营管理,认为其在管理体制上比较健全,其管理制度详细而且具体,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胡波(《试析清代陕西黄土高原地区常平仓储粮规模的时代变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专辑)、王水乔(《清代云南的仓储制度》,《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也分别对陕西和云南的仓储进行了研究。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对于仓储职官及其管理的研究。陈峰《略论清代仓场官吏的舞弊活动及其危害》(《西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认为清代仓场官吏的舞弊活动在历史上极为突出,它给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如太仓粮储损失、增加漕运负担等,这对清王朝的统治秩序产生了恶劣的腐蚀作用,之所以产生这一现象,与当时仓场官吏收入和地位不高、仓场监督制度不健全及清朝的腐败统治有很大关系。马学春《清王朝的粮食仓储官员》(《池州师专学报》2003年第1期)对清代朝廷、大内、盛京陪都、地方府州县及陵寝仓储官员进行了考察,认为清代仓储体系繁杂,人数众多,说明了清王朝的高度重视。

四、仓储制度研究的成果与展望

通过以上评述的这些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自民国以来,对于清代仓储制度的研究已经较为全面,许多问题都已经纳入到研究视野,且从时段上看,除了文革一段时期之外,对清代仓储制度的研究从未中断,对其中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也已相当深入,涌现了许多颇具眼光和特色的研究成果,一是对清代各种仓储的建立及其过程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对于各仓出现的时间,和背景更为明确;二是对各仓本身的研究较为深入,对常平仓、社仓、义仓等的性质、仓谷来源、经营管理及弊端等通过丰富的史料有了更为准确的研究,认识上也渐趋统一;三是通过对不同地域如广东、两湖、江南、陕北等仓储的研究为前两项成果更增添了个案上的支持,从而为总体上认识清代的仓储制度提供了研究材料与视角。这些成果的取得是难得的。

尽管如此,我认为还没有完成对清代仓储制度这一课题的完整研究,今后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一是对清代仓储官员吏役的研究尚不深入。虽然有学者已经对此进行了初步尝试,但是还处于宏观上的描述阶段,对于官员吏役的总体贪污舞弊情况虽有揭露但仍缺乏个案上的研究,对这些官员吏役贪腐的情况仍不明晰,因此通过清代一些大案要案来对他们贪腐的具体做法、行为模式及处理情况进行探析,必有一番作为;二是对于清代仓储法律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少,虽然在探讨仓储体系的过程中有的学者偶有涉及,但是也往往仅仅关注的是有关仓储建置、运营方面的法规,对于那些贪污舞弊、侵欺挪移、勒索盗窃之事的法律方面的研究比较少

见,而这些方面是构成仓储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只知其建置、运营管理而不知其犯罪与惩罚则难以起到鉴古知今的效果;三是研究方法与视域仍需扩大。仓储制度本身虽已复杂,但中国古代的仓储制度绝不是孤立的,它与荒政、救灾、漕运、军事等相关研究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其中仓储制度及政策的变化往往是与政治、经济相为一体的。仓储的稳定又对社会的稳定极具影响,因此在研究清楚以上内容之后,对仓储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及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不仅必要,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就必须充分借鉴其他一些研究领域的成果和方法,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小的视角透视大问题,必将取得更丰富的研究成果。

“垓下之战遗址高层论坛”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6月26—27日,由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安徽省历史学会主办,安徽省社科院历史所、灵璧县县委县政府承办的“垓下之战遗址高层论坛”在安徽灵璧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位历史地理学、文献学、秦汉史、考古学专家学者出席会议,邹逸麟、施丁、王云度、袁传璋、卜宪群等著名学者应邀出席。论坛针对垓下之战遗址方位及楚汉战争有关问题进行了集中而又热烈的讨论。

1. 垓下之战遗址方位的研究。垓下之战是楚汉之争的决胜之战,关于战场的具体位置,古代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说当今安徽灵璧东南沱河以北,二说当今河南鹿邑东。近代以来又有河南淮阳城下即古代陈城之下(简称“陈下”)说与安徽固镇东北沱河南岸说。针对学术界相关争论,邹逸麟指出,垓下之战遗址方位问题,关键在于陈下之战与垓下之战是一次战争还是两次战争的问题。如果是两次战争,那么垓下一定在灵璧,而《史记·灌婴列传》的有关记载恰好可以说明既有陈下之战,又有垓下之战。说垓下在灵璧,主要根据的是《汉书·地理志》的记载,班固依据汉代官方资料撰写《地理志》,把侯国放在沛郡而不是陈县所属的淮阳国,其资料来源相当权威。要驳倒垓下之战在灵璧的说法很难,除非出现汉简有关于垓下的新的记载。邹先生还就垓下为陈下讹误的说法进行了分析,指出讹误或笔误说太随意,历代历史地理学者相信班固的记载是有道理的。

施丁具体分析了垓下与垓下聚问题,指出楚汉之际的垓下,大体在睢水、浍水(今沱河)间开阔的平原地区,此地区当南北要冲,能容得下数十万人马驻屯和打仗,而三国魏人苏林以至酈道元等提到的“垓下聚”是当时人们聚居的村落,在故县,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明确说它在虹县(今泗县)西南54里,为浍县的一个聚落,到北宋初成书的《太平寰宇记》则明确标定垓下聚在虹县西50里,而浍县故城在县西南78里,垓下当今灵璧县东南、沱河以北。明清一些方志说垓下即濠城集没有举出任何根据,实属无稽之谈。

袁传璋认为,依据《史记》有关记载,楚汉相争最后决战发生在垓下毋庸置疑,陈下之战只是垓下之战的序幕。从《汉书·地理志》本注体例可知,垓下聚与浍城决非同地,近年濠城镇北“霸王城”考古发掘成果证实此处为“大汶口文化最早的遗址”,亦为秦汉浍城遗址,但认定